

《圣经》中的人体献祭

龚伟英

献祭是古代宗教崇拜中的主要活动,在古代,人们经常受到自然灾害的侵袭,人的生存时常受到威胁,朝不保夕,希望得到一种超自然力的保护,通过献祭,尘世之人获得了神灵的允佑,达到了与神沟通的目的,使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安全而顺利。《圣经》里提到的献祭有许多种,如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等,按其用途主要分为献礼和赎罪祭,献礼是指崇拜者在受到上帝的恩惠和允佑之后,常用献祭来谢恩;赎罪祭则是指人类的过犯破坏了神与人之间的盟约,恰如其分的献祭能使人的罪得赦免,恢复与上帝融洽的关系。在后来,献祭更是经常与赦罪联系在一起。

献祭中祭品的内容取决于事情的重要性。在日常的宗教崇拜中,人们可用谷物和水果献祭,如该隐用土地出产献祭,但一般用动物,特别是家畜,因为它们活物,又与人的关系密切,因此可以成为献祭者的象征。正如一只山羊放到旷野里,一去不复返一样,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通过将过错转移到羊身上,然后杀羊献祭,世人的罪就可以从他们的生活中除掉,后人“替罪羊”的说法就是从这种宗教仪式而来的。世人受的恩惠越多或是犯的罪孽越深,就越是需要隆重的献祭,因此,在一些重大的节日或关键的历史时刻,人祭是最好的选择。人体献祭指的是把人特别是童男或童女作为供品祭祀神灵,该作法起源于原始宗教巫术,是古代许多民族都曾经存在过的习俗,如在以色列进入的“流奶与蜜之地”的迦南地区,当地迦南人以孩童为祭品敬拜他们的神是常见的祭祀。

《圣经》中人祭的最早的详细记载是亚伯

拉罕燔祭献子。亚伯拉罕是以色列的第一代族长,上帝许诺要庇护他,让他的后人繁衍发展,为了考验亚伯拉罕是否坚守与上帝立的约,上帝要求亚伯拉罕将儿子以撒作为祭品献给他,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晚年得独子,把以撒献祭就意味着他的传宗接代受到了威胁,然而,信不信上帝,是否对上帝忠诚,关系到整个民族的兴衰存亡,非同小可,就在亚伯拉罕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的关键时刻,上帝向他指示,不仅没有叫他杀子,还赐福给他,亚伯拉罕也因此而赢得“信心之父”之称号。以撒虽然没有被杀,但从“奉献头生的”(出埃及记 13:1-2)的条例看,人体献祭尤其是童祭的这种仪式在其时和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却是非常盛行。在以色列信仰中,上帝是造物主和万能的神,若能得到神助,生活上必会美满幸福,沙场作战时也会所向披靡。耶弗他和他的女儿的故事就很好地体现了人体献祭用于献礼的隆重和悲壮。士师耶弗他为了打败亚扪人而求耶和瓦庇佑,许愿把回家时第一个出来迎接他的人献给耶和瓦。耶弗他是个大能的勇士,由于母亲是妓女,他被正妻的两个儿子赶出家门。后来亚扪人入侵,基列的长老们找到耶弗他,恳求他回来做元帅甚至整个基列的领袖,领导他们作战。对于出身低微的耶弗他来说,要想不再受到欺辱劣待,要得到别人的尊重,扬眉吐气,就必须要打胜仗,为了万无一失,耶弗他向耶和瓦寻求庇护,并发下重誓:如果取得胜利,就把回到家中碰到的第一个来迎接的人献给耶和瓦。耶弗他率众得胜,打败了亚扪人。耶弗他回到自己家中,唯一的女儿拿着鼓跳舞出来迎接他,他看到后就撕裂衣服,说:“我的女儿啊,

你使我甚是愁苦，叫我作难了，因为我已向耶和华开口许愿，不能挽回。”他的女儿回答说：“你既向耶和华开口，就当照你口中所说的向我行，因耶和华已经在仇敌亚扪人身上为你报仇。”又对父亲说：“有一件事求你允准：容我去两个月，与同伴在山上，好哀哭我终为处女。耶弗他说：“你去吧！”就容她去两个月。她便和同伴去了，在山上为她终为处女哀哭。两月已满，她回到父亲那里，父亲就照所许的愿向她行了。耶弗他的女儿甘为人牲，恪守誓言，成为可歌可泣例子。为了纪念她，此后以色列中有个规矩，每年以色列的女子去为耶弗他的女儿哀哭四天(士师记 11:34-40)。

因为信上帝，亚伯拉罕毫不犹豫把以撒献祭，耶弗他的女儿愿为牺牲。《圣经》是人与上帝之间围绕着信不信上帝展开。“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申命记 6:5)。当以色列人顺服、忠诚于自己的真神上帝，严格按所立之约办事，他们就昌盛。当以色列人崇拜异神偶像，违背上帝的意志和诫律，他们则遭到惩罚，“犯罪—惩罚—呼救—救赎”的反复模式贯穿了《圣经》的历史的始终。许多《圣经》学者认为，在耶路撒冷陷落，流亡他国前的很长一段历史中，以色列人并不是信奉真正意义上的一神教 (monotheism)，而是单一神教 (henotheism)，即信奉一个主神，但同时也不否认他神存在。在当地高度发达的文化的的影响下，他们屡次悖逆上帝拜当地的迦南诸神特别是巴力神，祭拜其化身公牛犊。无论君王贵族，或是平民百姓，崇拜异神偶像被视为最严重的罪，人人都需要悔改和受宽恕，献祭就是为了满足这种需要。亚哈斯王由于自己在宗教和政治上的错误举措而使国家遭受灾难和不幸，情急之下，用自己的儿子献祭，以求逆转临头之灾(列王记下 16:5-9)。但此举并未扭转乾坤。这也从另一方面提醒人们上帝是正义和道德的化身，以色列作为民族整体，历经了漫长的岁月才学会了这一课。因此到后来赎罪祭得到更多重视，并逐渐成了以色列宗教中的一个固

定仪式。

为赎罪而进行人体献祭的仪式在新约里得到了延续和升华，献祭成为联系旧约和新约的重要内容。在基督教信仰中，人生下来就是有罪的，每个人出生后所犯的“本罪”，可用善功补赎，但是，对于原罪，人是无能为力的，无论做多少善事也脱离不了原罪。原罪源于《创世纪》中亚当、夏娃偷食禁果而犯下的罪，这罪遗传给后世子孙。由于人类既有原罪，又无法自救，上帝不忍心让人类永远沉沦，乃差遣上帝圣子道成肉身，用自己的生命作赎价，被钉在十字架上代人受死，第三天复活。旧约献祭崇拜中的一切应许都由耶稣的生、死、复活兑现，耶稣之死成全了律法的要求。耶稣以身殉难被看成是作为献祭的羔羊而死，而由于他的死，“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彼得前书 2:24)，他的死是作为“上帝的羔羊”(约翰福音 1:29)，除去世人罪孽的，与以往的人体献祭不同的是，耶稣的受难不是为个别人赎罪，而是为天下所有人赎罪；同时，耶稣献的是“一次永远的赎罪祭”，以一种彻底的方式赦免人类的罪，使人类真正“手洁心清”(诗篇 24:4)地敬拜上帝。更重要的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体现的是上帝的意志，是最高主宰的预先安排，通过耶稣的受难和救赎，整个人类和上帝实现了和解。

耶稣献己为祭不仅仅是对旧约献祭的重新解释，而且引出了全然不同、具有革命性的某种东西。据《福音书》(马太 26:26-30;马可 14:22-26;路加 22:15-20;林前 11:23-25)记载：耶稣在受难前夕与十二门徒共进“最后的晚餐”时，耶稣拿起饼来祝谢，掰开分给门徒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耶稣又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为多人流出来，是罪得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为了让信徒们得到救赎，耶稣用饼和酒的形式象征性地将自己献上。后来，教会根据这些记载设立了最重要的礼仪—

—弥撒圣祭,简称“弥撒”。在这个仪式中,祝圣圣体(用饼和酒代表基督)是弥撒圣祭的最高峰,祝圣面饼的经文:“这是我的身体。”祝圣葡萄酒的经文为:“这是我的血,新约和永约的血,信德的奥秘,是为你们和大众倾流的,以赦免罪过。”在基督教看来,在弥撒中用的饼和酒中隐藏着基督的奥体(mystical body),因此这项礼仪是一种献祭,是用不留血的形式再现当年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的献祭,是人体献祭的一种象征方式,上帝子民通过分享祭品的血和肉与基督“合为一体”。从其功用看,该仪式既是一种献礼,感谢耶稣的救赎之恩,同时也是赎罪,是从罪和罪的后果中得到基督救赎的外在象征。

崇拜是宗教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最初的日子开始,上帝的同在就是靠有组织的

崇拜来体现的,这种崇拜代表的不仅是上帝自己的信实和伟大能力,人对上帝的感恩,且是误入歧途的人洗心革面得宽恕的途径。从亚伯拉罕欲杀子以奉神,耶稣被钉十字架而为人类赎罪,基督教开创了一种以献身殉道为至高美德的传统,基督徒以教堂是殉道者的血凝成的而自豪,称自己教会建筑的某一部分为“祭坛”,尽管上面从没有洒过一滴血。在现今的文化环境,献祭不断成为基督教崇拜中不可缺少的一个象征性的概念,并成为基督教信仰的精髓。随着献祭仪式的日益象征化,人体献祭逐渐为动物牺牲或象征物所取代,这种转变其实也就更加凸现了仪式中所代表和象征的含义,因为当宗教注意力已不再专限于祭品内容时,崇拜活动便获得了一种新的意义。

《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原《中华归主》再版)

《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 1901—1920》是基督教(新教)1901—1920年在华传教事业的统计资料,内容丰富翔实,其范围太大超出了宗教状况。该书曾分别于1922年和1987年在国内出版。现改名为《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重印再版,内部发行。

此书为当时中国基督教会(新教)的一级组织“中华续行委员会”出于传教及摸底等目的而执行的一次对全中国的基督教发展状况的调查。调查年限是1900—1920年,调查开始于1918年,整理成书问世在1922年,当时中英文同时出版,中文书名为《中华归主》,但其内容只节译了英文版的一半。80年代中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为了学术研究需要,组织人员重新翻译英文版全书,并斥资印出上卷。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其书的中下卷,为配套,将宗教所自印的上卷包装配套,版权页写“内部发行”。当时三卷总计1760千字,标准16开。这本书是了解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历史的一面镜子,而且是研究当时中国基督教传教状况的最全面的资料。迄今为止,作为全面了解当时中国国情的资料,它具有绝无仅有的文献资料价值。当时印量有限,早已售完难寻,虽一直有广泛的需求,但因种种原因一直未能重印。

书内对我国20世纪初期各省的行政区域、面积、边界、城市人口、地势、山川、民族、语言、气候、物产资源、经济状况、交通、邮电、教育、医疗设施等以及传教史和宗教活动情况等,都进行了极其周密的调查研究,其广度和深度远远超出了传教的范围。因此,本书不仅是研究中国基督教史非常难得的珍贵文献,更是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状况的第一手资料性工具书。原书中有大量的图表,地图320幅,其他图表125幅,图表多为手绘。由于当时的印刷工艺,有些图表不是很清楚。这次重印,译者修订了原版中存在的一些错漏;内容经过重新编校,印刷质量也得到了很大提高。全书16开精装,分上下两册。(希言)